

朱鴻林，《儒者思想與出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465頁。

《儒者思想與出處》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朱鴻林明史研究系列》第三卷。此書收錄朱鴻林討論南宋至清代，特別是明代重要學者的思想、學術、交遊情形的論文19篇，旨在反映這些學者個人或時代的特色，及其重要著作的著述背景、緣起、影響以及思想文化史意義。

本書首兩篇文章對宋元明思想史研究中的不足之處及新進路進行了整體觀察。作者指出，現存近世思想史著述所關心的問題尚未超出《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多少，仍多是「理學、心學等高深理念的述論」。此種單純探討抽象理念的論述方式，未能揭示士人真正的思想對象。事實上，宋元明時代的士人絕大多數有着從事經世之學的共同理想。對於程朱、陸王學派兩大主流學派之外的思想史問題，學者未涉及之處甚多。特別是對朱子、陽明各自身後學術傳播的情形，有待深入研究。在現代學者佔有大量資料的情況下，對人物傳記及著作的研究不但應成為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新進路（頁37-38），亦「足以擴大和充實宋元明思想史研究的未備之處」（頁5）。

書中的多個實證研究，便是從上述研究空間和進路出發進行探討的。在〈十五世紀之學術趨勢〉一文中，作者認為心學一派的崛起並非當時唯一的學術趨勢。該世紀的主要學術趨勢，是受《大學》薰染的學者和文官對治國平天下的追求。知識份子對「齊家」的努力、對宗族的種種建設和將理學價值貫徹到地方社會組織的努力，即是這一趨勢的明確反映。「土木之變」後，面對政治危機，士人尋求變革和補救的方案，從而出現了兩種並行展開的運動，形成學術新趨勢。其時，除一批士人強調「正心」之學外，還有士人認為問題在於制度上的失敗，堅信君子要掌握各種知識，以令政府能夠良好運作，此即「經世之學」。當時學者對被朝廷認可的宋儒學說的質疑、對宋史的討論、對實務的興趣、對世俗知識的涉獵，都是「經世之學」的表現。

書中收錄論文主要展示了作者對近世經世之學、學派分合、儒者出處等問題的研究成果，亦有關於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天主教徒士大夫的思想的討論。作者對《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聖學格物通》的系列研究，反映了經世之學從南宋到明中葉的變化情形。作者將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定義為「理論型的經世之學」，指出該書實為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

物，其預定讀者為宋理宗。在《大學衍義》中，真德秀對《大學》八條目的前六條進行發揮，分為「四要」。此書是在楊太后及權相史彌遠專權的現狀下，真德秀希望理宗具備決心、奪回大權之作。但這部有特定目標的著作卻不足以應對變化巨大的明朝中期政局。丘濬以補撰命名的《大學衍義補》，正是為了回應15世紀危機的巨著。

《大學衍義補》雖是補充《大學衍義》之作，然兩者內容及目的均有不同。丘濬的預期讀者則包括以皇帝為首的所有統治階層成員，目的是要解決整個國家制度、政府運作和社會面臨的危機。丘書着重發揮《大學》八條目中的最後兩條「治國」、「平天下」，不僅提出了完整詳備的即時改革方案，且對後世有實在影響。在明代，該書的版本、反應性著作眾多。通過對《大學衍義補》的影響的研究可以看出，明人除對理學的義理思維問題興趣深厚，亦熱心於經世之學。湛若水於嘉靖初年仿《大學衍義補》而作並上呈明世宗的《聖學格物通》即是一例（頁102-128）。朱鴻林認為，在嘉靖初對楊廷和等人有所同情的湛若水畏懼世宗追究，遂將幫助世宗增進修身為政的學問和涵養的《聖學格物通》當作向世宗盡忠補過的工具。可是，因湛若水所處的職位以及他個人的政治識度、從政經驗，均使他無法對治平天下提出具體建議，而只能盡力闡揚他自己「隨處體認天理」的理學學說，因而未能打動明世宗和當時儒者。

作者在書中對葉春及、呂坤的研究着重反映了明代中後期身為地方官的經世學者的理論與功業。〈略論葉春及之功業和經世政論〉一文依葉春及的生平大概，論述其在政論、行政、學術三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指出葉春及的政論應屬於海瑞、丘濬、陳建等嶺南前賢經世之學傳統。〈呂坤的志業和思想特質〉一文則介紹了前人對河南學者呂坤的生平、成就與思想及「真、實、新」的學問特點，提出呂坤的言行、傳記、著作、交遊、家鄉，及其所生活時代的社會現象，皆有待深入研究（頁204）。

作者對丘濬《朱子學的》的研究，則着重揭示了該書與宋元明初朱子學發展脈絡的關係。儘管朱子學在明初已成為官學，但「系統性地表達朱子學說的工作，尤其幫助初學者掌握更改以利深造自得的」（頁204），仍屬不足。《朱子學的》在15世紀下半期的出現實具有一種劃時代的意義，標誌朱子學者對如何傳授朱學精義的新體認。丘濬可說是「朱子的忠臣」（頁226）。

對儒者的「出處」問題，作者以陳白沙為個案進行了細緻研究。陳白沙的大半生都被出處問題所困擾。作者通過研究陳白沙詩歌，提出陳白沙對出

處問題的原則是「以我為主的」。陳白沙的看法是，儒者出仕是為了行道，既不可隨便不仕，也不能失身而仕。「出處惟時、與時偕行」是白沙處理出處問題時的理論依據（頁266-267）。這正反映了士人的主體意識在陳白沙時代正在加強。

陳白沙的重要朋友、門人亦曾為出處問題所困擾。作者研究了陳白沙及其門人林光各自對對方出處問題的意見，認為林光對陳白沙的出處表現較滿意，陳白沙則對林光的出處表現甚為不滿，因林光在母親加老的情況下未「將養母之念放在首位，以至母死不在」（頁297），陳白沙因而不能原諒他。陳白沙這一態度，反映了其學術的最精微處：他認為林光未完全習得「真心誠意的為己之學，自得之學」（頁266-267）。

書中還通過對一批學者的生平和著作進行個案研究，討論了程朱、陸王兩大主流學派之外的明代學者的學思歷程及其背後的學術傳承、學派分合等問題。張詡與湛若水同為自謂得陳白沙之傳的學者。張詡承陳白沙退隱自修之風，湛若水則樂於入世應酬，而陳白沙實則「優湛於張」（頁303）。嶺南大學者黃佐雖學宗朱子，但在理氣問題上與朱子不同。對於有心招徠他入門的王陽明，他亦不能完全認同，而是「始終只與陽明為友」（頁322），實為一具有獨立性的思想家。永嘉學者項喬亦是對朱子學、陽明學皆有所反思的學者。他的學術取向令他大致可從不接受王學的廣東學者處得到「論學之益」。廣東學者雖不完全同意項喬對心性之學的見解，但仍極度推崇其人品與志行。在16世紀晚期，反對陽明學的學者亦有新動向。學宗甘泉的澄海學者唐伯元激烈反對陽明從祀，並指責陽明忽視甘泉學的來源——陳白沙。唐伯元還曾進呈《古石經大學》，反映了其不同於朱、王的學術觀點。

書中所收〈《四庫提要》所見盛清學術偏見一例〉一文，為《四庫全書》編纂及乾嘉學術研究提供了深具參考價值的上佳案例。本文討論四庫館臣何以對《類博雜言》、《蒙泉雜言》這兩部內容相近的著作評價截然不同。作者認為，造成此種不同的原因除館臣內部的漢宋之爭外，還有對《類博雜言》作者岳正的歷史評價、館臣的地域認同等因素。實際上，《四庫提要》中頗有具偏見的內容。可見，「18世紀的考據學並非完美無缺之學」。《四庫全書》各書的提要情形，則「反映了官家編纂專案缺乏一致性的毛病」。需多了解這些具偏見性的內容，方可令「18世紀的思想史獲得一個更為周延的概論」（頁53）。

縱觀全書，作者不但指出了現存近世思想史研究著作存在的問題，亦指出傳記、學者著作等文獻對於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明代思想史的研究空

間。作者概括了15世紀理學與經世之學並行的思想趨向，繼而用一批個案研究了理學學者對出處問題的思考或學思歷程，探討了部份學者的經世思想與實踐，並對一批天主教徒士大夫的信教過程乃至理學思想進行討論。從這些豐富的個案中，可看出15世紀的丘濬以《大學衍義補》探討「治國平天下」之學的努力、陳白沙對出處問題的考量及白沙身後江門學派的分裂；可看出16世紀黃佐等具有獨立性的學者在主流學派之外探求新學術取向的努力，以及葉春及、呂坤等經世學者的思想及事功；還可看出17世紀早期部份士大夫何以接納西方宗教，並如何調適天主教與理學的觀念。這些研究豐富了學界對近世中國思想史之複雜性的認識，亦揭示了明代思想界中多彩的學術取向、學派傳播、分合情形以及一批士人念茲在茲的出處問題。

本書既反映了作者從其所揭示的思想史研究進路入手所取得的成果，也指出了多方面可供繼續探討的新空間。如作者所言，目前其研究「還在積累個案，等待總結」（〈總序〉，頁6）。因此，更多的深入個案研究當有助於學界對近世中國思想史形成新的整體了解。對於《大學衍義補》的反應性著作，作者研究了湛若水的《聖學格物通》。若能對《大學衍義節略》、《中庸衍義》、《皇明繩武編》、《皇明世法錄》等《大學衍義補》的反應性著作及其作者進行充份研究，或可對明儒的「上層」經世思想在明中後期的演變情形產生新的認識，並探究當16、17世紀的明帝國面臨着與15世紀不同的政局與危機時，受《大學衍義補》影響的儒者曾提出過何種應對時局的方案。

孫天覺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吳琦、趙秀麗，《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一項基於社會類群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390頁。**

中國二千餘年的帝制時代，很少有一個朝代如明朝般持續出現「問題皇帝」：身居九重卻不履行皇帝的職責，行為荒誕、怪異、叛逆、怠政、嗜酒、縱欲、貪婪（頁24）。他們中有慵懶怠政，乃至幾十年不上朝的；離經叛道，自甘為大將軍、小木匠的；酒色財氣，鬧得民不聊生的；殘暴任性，將文武大臣杖責致死的。從明代民間對他們的稱呼可見一斑：「蟋蟀皇